

# 當代中國民族政策下的羌族及其 歷史—兼評中國少數民族研究 中的「近代建構論」

王 明 珂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 摘 要

羌族的形成，經歷了一個相當複雜的近代過程；涉及西方傳來的國族主義與「民族」概念，漢族知識分子的國族建構與相關歷史書寫，各層次核心與邊緣人群間的權力關係，以及此關係下的羌族本土的歷史、文化及語言建構。更重要的是，所有這些近代過程也是歷史上漢人（或華夏）藉著對「羌」的詮釋與再詮釋以刻劃我族邊緣的過程之一部分。

在這一篇文章中，我首先簡略說明「羌」在中國歷史與歷史記憶中的地位，然後說明「羌族」成為中國少數民族的近代歷史與文化過程；特別是在中國少數民族政策下，羌族認同及其族群本質的本土發展與建構。最後我也藉著羌族的例子來說明，在詮釋中國南方與西南民族之形成上，目前流行的近代建構論不足之處。

關鍵詞：羌族、族群本質、中國少數民族、國族主義

\* \* \*

## 一、前 言

在中國少數民族研究中，將中國北方與西方的滿、蒙、藏族視為一個個歷史悠久的民族，在這一點上大多數學者所見並無基本歧異。只在個別民族的範疇上，學者們的認知或有些出入。然而在中國西南與南方民族方面，對於各民族的分類與識別，學者之間便有許多的爭議。此種爭議早出現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從事民族調查與識別的中國學者之間，近年來也出現在分別將民族視為「歷史實體」與「近代建構」的中西方學者間。

在歷史上，漢人一直未能清晰的認識、系統的劃分西南與南方各土著人群。苗、

蠻、獞、夷、爨等稱號，長期以來便為漢人用以泛稱西南與南方各族群。清末民初時期，在「民族」概念下，漢人知識分子或將所有南方或西南人群稱作「苗族」、「夷族」，或認為他們已相當漢化因此將他們視為「漢族」的一部分。因此，國民政府時期中國在民族政策上也鼓勵西南土著人群漢化。到了中國共產黨執政初期，基於馬克斯主義中的民族定義與思想，中國積極進行少數民族識別以便推行相關民族政策。此時，西南民族的識別、分類問題逐漸浮現。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大批調查小組人員深入各邊遠地區，蒐集語言、體質與民族誌資料，以期作成科學的民族分類。學者們也在中國歷史材料中鑽研，期望藉此了解各個民族在歷史上的分合，及其族稱的歷史變化。最後根據這些資料，經過一番辯駁、修正與增添後，當前 55 個中國少數民族被識別出來，並得到國家的認可。其中有 25 個少數民族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區。雖然仍有些中國西南地方族群仍努力期望成為單一民族，但由於問題複雜，辯駁無已，因此自一九七九年起共產主義中國不再識別成立新的民族。

與民族識別工作相關的是民國以來的少數民族歷史、語言與文化研究。此種基於新的歷史學、民族學、體質學及語言學之民族研究，事實上為民族識別奠定了重要基礎。在民族識別後，少數民族研究更成為中國人文社會研究中的一支主幹。藉此各個民族客觀的語言、文化與歷史逐漸清晰化、範準化——民族被認為是有共同語言、文化，並在歷史中延續的人群實體。此民族知識也傳播入少數民族之中，受到本民族的關切與討論，也因此強化了民族成員的主觀認同。同時，中國陸續推動其民族政策——主要是少數民族自治，與對他們的各種優惠及補助。其先，由於受各時期政治運動的影響，政策常有改變。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始，少數民族自治及相關政策才有較穩定的成長。於是，透過文化與歷史建構，以及宣傳、展示與學習，自治區的少數民族成為中國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員。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後，許多中國之外的研究者，特別是人類學者，得以進入中國少數民族地區從事田野研究。由於現代人類學強調社會文化中的政治與歷史因素，以及受更廣泛的後現代解構學風之影響，許多研究西南與南方民族的西方學者都注意到中國少數民族分類的問題。他們質疑：為何許多語言、文化有相當歧異的族群，被統稱為彝族、苗族或壯族？他們的疑問在於一個更根本的問題：究竟什麼是「民族」或「族群」？這也是在七十年代以來，西方人類學者們一直辯論不休的問題。有此學術背景，自然他們很容易發現中國學者所相信的「民族」與「歷史」之近代建構性，及此少數民族歷史建構（及民族分類）背後的族群政治與權力關係<sup>①</sup>。

基於近年來我在羌族地區的田野調查，以及由文獻分析所呈現的歷史背景，我認為將羌族視為一「歷史民族實體」或「近代建構」，都有其可商榷或不足之處。在這

註① Dru Gladney, *Muslim Chinese: Ethnic National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Cambridge: Council of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1); Stevan Harrell, "The History of the History of the Yi," in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ed. by Stevan Harrell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5); Colin Mackerras, *China's Minorities: Integr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J. T. Dreyer, *China's Forty Millio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一篇文章中，我首先簡略說明「羌」在中國歷史與歷史記憶中的地位，然後說明「羌族」成爲中國少數民族的近代歷史與文化過程；特別是在中國少數民族政策下，羌族認同及其族群本質的本土發展與建構。最後，藉著這個例子我將討論目前流行的民族形成「近代建構論」之不足之處。

## 二、中國人「羌族」概念的形成歷史過程

在當今中國人的民族知識中，以及在他們的歷史知識中，「羌族」都是一個從遠古延續至當代的民族體<sup>②</sup>。在過去的著作中，我曾由不同的觀點——邊緣觀點——來說明由商代至近現代中國人心目中的「羌人」概念變遷。在這一節中，我簡述此一歷史過程。

### (一) 漢代華夏西方族群邊緣的形成

首先，「羌」是商人、戰國時人、漢晉人以及於近代漢人對西方異族的一種稱號。約當西元前十三世紀，商人稱某一區域爲羌方，稱那兒的人爲「羌」。學者一般認爲「羌」在殷商的西方，大約在河南西部、山西南部與陝西東部一帶。他們在商人眼中是敵對的西方異族。西元前十一世紀，周人崛起於渭水流域，結合西方各族群的力量共同克商。西周時人並未稱任何異族爲「羌」；西方異族在這時普遍被稱爲「戎」。此時西方的「戎」大約在陝西寶雞附近或在此以西、以北的地方。春秋戰國時期，隴山以東的「戎」多被秦人征服。也在這時期，東方諸國的「華夏認同」逐漸形成。隨著秦人的華夏化，他們統治下的「戎狄」也逐漸成了華夏的一部分，如此華夏的西方族群邊緣持續向西漂移。戰國晚期中國文獻中，「氐羌」指西方傳聞中的異族。這些異族「在秦之西」。戰國之後，秦漢帝國的政治統一帶來疆域與族群認同的擴張。往西方，中國的政治控制、中國式的農業與文化價值，都向西移到任何適於開墾種植的地方。由於對西方人群的認識愈來愈多，「戎」已不適用於用來描述所有西方非華夏人群。在此背景下，原來模糊的、神話式的西方異族概念「氐羌」，分裂成兩個人群稱號——「氐」與「羌」，被秦漢時人用來稱隴西一帶不同的西方人群。這一帶地方，在秦與漢初也被稱作「羌中」。

由西漢初到東漢時期，華夏心目中的西方異族「羌人」與地名「羌中」的概念繼續向西漂移。終於，在後漢到魏晉時期（公元 25~220, 221~419 年），被中國人稱做「羌」的人群廣泛分布在青藏高原的東部邊緣，少數也分布在北部邊緣。此帶狀區域包括：天山南路，青海東北部（河湟），甘肅南部，四川西部與雲南北部等地，如此由北而南形成一個狹長的「羌人地帶」。此地帶便是漢晉時人以「羌」的異族概念爲

註② 此種羌族史，我稱之爲典範羌族史。結合清末以來累積的研究成果，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許多學者都投身於這種羌族史的書寫。見顧頡剛，「從古籍中探索我國的西部民族：羌族」，社會科學戰線，第一期（一九八〇年），頁一一七~一五二；馬長壽，氐與羌（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任乃強，羌族源流探索（重慶：重慶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冉光榮、李紹明、周錫銀，羌族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

劃分的華夏西方族群邊界。以上「羌」或「氐羌」這些概念的變遷，表現的是「華夏」形成過程中其西方族群邊緣的變化。因此，當我們在歷史文獻中爬梳由商代到漢晉之「羌」的歷史時，我們所建立的不是一個「異族」的歷史，而是「華夏」自身的歷史，或「華夏邊緣」變遷的歷史<sup>③</sup>。

## (二) 羌人帶的萎縮：漢化、番化與夷化

七世紀時，原在「羌人地帶」之西的吐蕃興起，建立一與唐代中國相抗衡的王國。吐蕃王國的向東急速擴張，造成她與唐代中國沿著青藏高原東緣發生劇烈的衝突。而這個夾在中國與吐蕃的中間地帶，也就是上述的「羌人地帶」。由七世紀中到八世紀，吐蕃王國幾乎征服了所有這「羌人地帶」上的各部落聯盟與國家，如羊同、宕昌、鄧至、党項等，以及中國的邊邑州縣。九世紀時，吐蕃王國逐漸衰微而終於崩解。雖然如此，吐蕃的影響力仍持續存在於「羌人地帶」上。這主要表現於：一、在宋、元、明、清時期，這地帶上大多數地區仍控制在自稱是吐蕃貴族之裔的各地地方部落酋長手中；二、吐蕃的佛教（後來被稱作藏傳佛教）在元、明時期廣泛而深入的在這一地帶傳播，如此造成此廣大地區某種程度的文化共性。無論如何，由於廣泛「吐蕃化」所造成的文化現象，使得宋代以來，特別是明、清時期中國人泛稱此「羌人地帶」上的人群為「番」。這個稱號有兩種含意：吐蕃遺民，或「蠻子」<sup>④</sup>。

對中國人來說，「羌」代表一個模糊的漢與非漢族群邊界。太多的歷史記憶——如三苗、姜姓、大禹和神農——可以將「羌」與中國人聯繫在一起。相反的，「番」代表嚴格劃分的漢與非漢族群邊界；唐代中國與吐蕃間長期戰爭中的挫折，強化了中國人心中「番」的異類性。當愈來愈多西方「吐蕃化」人群被中國人稱為「番」或「西番」時，過去以「羌」這個異族概念為劃分的華夏西方族群邊界，一種較模糊的華夏邊緣，逐漸被「番」這個更嚴峻的異族概念所取代<sup>⑤</sup>。

除了「番化」之外，另外兩種情況也使得「羌人地帶」在唐代以後日見萎縮。一是，此地帶上部分人群的完全「漢化」。另一則是，此地帶上部分族群在中國人心目中的「蠻夷化」。後者主要發生在此地帶南端。此地土著原被稱做「旄牛羌」；其位置大約是在四川南部涼山地區及西昌一帶。宋代之後，新的地理與人群知識，使得中國人將許多西南族群稱做「夷」、「蠻」、「爨」或「僂」。於是原為「旄牛羌」所據之地的非漢土著，在宋、明時期被稱為「蠻」或「夷」。

「羌人地帶」萎縮後，中國人心目中的最後羌人只在岷江上游與北川間。清代張澍之《蜀典》中記載：

註③ Ming-ke Wang, *The Ch'iang of Ancient China through the Han Dynasty: Ecological Frontiers and Ethnic Boundaries*. Ph.D. dis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1992); 王明珂, *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 (台北: 允晨文化公司, 民國八十六年)。

註④ Ming-ke Wang, "From the Qiang Barbarians to Qiang Nationality: The Making of a New Chinese Boundary," in *Imaging China: Regional Division and National Unity*, ed. by Shu-min Huang & Cheng-kuang Hsu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1999).

註⑤ 同前註。

《漢書·西羌傳》西羌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又云羌無弋爰劍子孫各自為種，即武都、參狼、廣漢、白馬、汶山、冉駝、巴中板盾，今松潘、茂州諸夷也。

張澍心目中漢代西羌之遺民，當時的「松潘、茂州諸夷」，也就是約當今日由松潘到茂縣、汶川的岷江上游羌族。

### 三、二十世紀前半葉岷江上游與北川地區的村寨人群

由十四到十九世紀，漢人文獻對青藏高原東緣之異族最普遍的稱號是「番」，以及「蠻」與「夷」。一般而言，「番」指青藏高原東緣較藏化的人群，「蠻」與「夷」主要指在此之東或東南的西南各族群。岷江上游地區，可說是「番」、「夷」與「漢」的中間地帶。明、清時期，在所有被泛稱作「番」、「蠻」與「夷」的人群中，只有岷江上游與北川地區的土著仍經常被中國文獻記錄為「羌」、「羌人」或「羌民」。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民國時期絕大多數當地土著並未有「羌族」的概念，也不認為由松潘到茂汶這一片地方的居民都是「我族」之人。下一節中我將說明他們成為羌族的近代「民族化過程」。在此我先說明當時中國官方與土著對本地族群分類的不同觀點，以及「民族化」之前當地的族群狀態。

民國時期的四川，各地軍事統領以「防區」分割勢力範圍，有如軍閥割據。民國十七年，岷江上游與北川地區為二十八軍所據。該軍在本地成立「松理懋茂汶屯殖督辦署」。直到民國二十四年中央軍入川，川西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本地才被劃歸四川省第十六專區管轄。據民國十七年二十八軍在本地區的調查報告，《松、理、懋、茂、汶：五縣三屯情況調查》<sup>⑥</sup>，調查者認為當地民族有漢族、回族、羌人、夷人、歸流夷人、獐獐子與西番人等。此種民族分類概念與目前羌、藏、回、漢之民族區分間的「落差」，是我們探索「民族化」過程的關鍵。

調查資料中「戶口」一節中記載，屯區中的「民族」有漢族、回族、羌人、夷人、歸流夷人、獐獐子與西番人。有趣的是，在同一節裡的「各民族眾寡比較圖」中，又將漢人分為土著漢人與客籍漢人。在隨後的「民情異同一覽表中」，對於以上各「種族」的性情及職業都有描述。究竟「土著漢人」、「歸流夷人」或「羌人」等指的是當今那些人的祖先？我們可以從資料所記載各種族的民情、職業、風俗，與其分布區域等訊息來探究。

首先，漢人被分為兩種：土著漢人與客籍漢人。客籍漢人，以「安岳、綿竹、灌縣、北川、安縣等地人為多」；他們「多營商業，間以手工為業」。這些人是由外移入的漢人，較無疑問。所謂「其人多屬屯兵之後」的「土著漢人」，資料中稱其「質樸、怠惰，多務業農」。文中原有「渾厚」、「性喜潔」等語，後來被編撰者刪去。

註⑥ 《松、理、懋、茂、汶：五縣三屯情況調查》稿本，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八軍松理懋茂汶屯殖督辦署編。西南民族學院圖書館藏。

渾厚、質樸與潔淨，是當前許多羌族自我宣稱的民族本質特徵。而且，當今只有綿箠以南有漢族農村聚落，綿箠及以北的汶川、茂縣農民皆為羌族或藏族。顯然，這些土著漢人絕大多數後來成為當今羌族的祖先。

其次，調查資料中的羌人，「性質尙良□以農牧為業」<sup>⑦</sup>；「以茂縣西路與松潘東路為多」。「性質尙良」應是說他們的性情本質處於較剽悍的西番、獐獐子與質樸的土著漢人、歸流夷人之間。由這些資料可以知道，這指的是當今部分羌族的祖先；特別是住在岷江西岸各溝（茂縣西路）與松潘官道沿線（松潘東路），過去不屬土司管轄的村寨人群。此記述也說明，茂縣東路與汶川的鄉間村寨人群，當時並沒有被視為「羌人」——他們被視為「土著漢人」。

「性質誠樸，多以農牧為業」的「歸流夷人」，其分布以「松潘東路與茂縣為多」。也就是說，他們與羌人一樣的以農牧為業，但似乎在漢人眼中其性情比羌人還要良善。然而，由於調查資料曾提及「夷人」使用番文、番語，因此「夷人」之稱又說明漢人調查者認為他們與「番人」，也就是今日的藏族，關係較近。岷江上游各土司常自稱是吐番名門後裔，「嘉絨藏語」又是土司間的共同語，可能因此在改土歸流後其子民被稱作「歸流夷人」。事實上，各土司的子民不一定是說嘉絨語的土著；譬如，瓦寺土司之屬民便有「土民」與「羌民」之分。再者，如今茂縣並無說嘉絨語的村寨。因此所謂「歸流夷人」，至少在茂縣的這一部分，應該也是今日羌族的祖先。最後，「以劫掠為榮」的獐獐子指小黑水一帶的村寨居民；西番兼指務農的嘉絨藏族（又稱熟番）與遊牧的草地藏族（又稱生番）；「強悍好勝，職業不一」的回人便是今日之回族。這些都較無疑問。

這分資料說明，直到一九二〇年代末，熟知岷江上游土著族群文化的漢人還沒有明確的「羌族」與「藏族」概念。更值得重視的是，資料中以外來者或土著主觀所見的「民情」（如質樸、怠惰、性情不一等），及易變的「職業」（如多務業農，多營商業）來描述各個民族的特色；從今日我們的民族知識概念來說，是相當不可思議的。事實上這正反映了在典範的民族概念尚模糊，以及各種「客觀學術」所建立的民族語言、體質、文化等分類資料尚不可得之時，漢人觀察者的民族分類觀點。

以上只是中國文獻記憶所見的狀況。近年來在當地的田野採訪中，我由一些老年人的口述記憶，加上一些文獻資料，也得知本世紀前半葉當地的一些情形。這些口述資料所見，特別是在族群認同與分類上，與漢人文獻所展現的狀況有些不同。

首先，幾乎所有的中老年羌族報告人都說，他們年輕時沒有聽過「羌民」或「羌族」這個詞；他們被漢人稱作「蠻子」或「獐獐子」。「羌族」是解放後才聽人說起的，在過去他們從未自稱「羌族」。其次，在過去他們對於「本族」，或「我們的人」，此一概念的認知相當歧異、模糊。在茂縣黑水河流域各溝人群之中，有「赤部」、「而」與「爾瑪」的人群區分概念<sup>⑧</sup>。「爾瑪」是指「我們的人」或本族的人；「赤部」是上游的野蠻人，或說是吃生肉的人；「而」是下游狡滑的漢人。當代羌族

註⑦ 性質尙良之後的口記號，指此處原有一字污損不明。

註⑧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允晨文化公司，民國八十六年），頁三三三。

都將「爾瑪」等同於「羌族」。但中老年人卻還記得，從前他們都以為「爾瑪」就只是本溝或本地區（幾條溝）的人。他們並將所有上游的人都稱作「赤部」，將下游的人群視為「而」。也就是說，在孤立的認同下，每一自稱「爾瑪」的人群都認為本族群在漢人與蠻子的包圍之中，但同時他們也被別人認為是漢人或蠻子。在北川的白草河與青片河流域，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城鎮的人罵山村的人「獐獐子」或「蠻子」，山間各下游村寨的人罵上游的人「獐獐子」或「蠻子」，而各地的人都自稱漢人。如此，當地一句俗語「過去一截罵一截」，便是以上「爾瑪」認同（茂縣、黑水地區）或漢與非漢關係（北川地區）的最佳寫照，也說明過去這一帶人群認同的狹隘與孤立。

其次，以上所述「爾瑪」與「蠻子」間，以及「漢」與「非漢」的模糊族群邊界，並非只是土著主觀的想像，也部分基於客觀的歷史事實。在父系方面，清代以來大量漢人進入本地討生活，他們或為駐軍、小商人，或為逃荒的難民。除了部分留居山間城鎮者外，相當一部分流入土著村寨之中。他們以「上門」（入贅妻家）的方式與土著女子成婚，也因此造成一些父系有漢人血統的家族。更普遍的是，由於漢人移入帶來的「漢人祖源記憶」被借用；在「蠻子」普受歧視的族群關係下，許多土著家族自稱祖先來自漢人地區。特別是「湖廣填四川」之說，造成許多自稱祖籍為「湖廣」的家庭。另外在母系方面，岷江上游地區的自然與人文生態，在各溝寨人群間形成一種嫁娶模式，那就是女子往生活較好的下游地區村寨嫁。而在前面我曾提及，在狹隘孤立的認同下，上游村寨人群常被人們視為「蠻子」，或認為他們可能帶有「蠻子」血液。於是「蠻娘漢老子」這句流行在當地的罵人話，反映了一些社會與歷史事實（與想像）造就的家族與家族間的歧視。

溝中村寨居民此種狹隘、孤立的族群認同，有其特殊的自然與社會背景。在此青藏高原邊緣地區，一條深溝的地理封閉性，以及溝中居民多元的經濟生態，都使得「溝」成爲一個獨立而值得保護的區域<sup>⑨</sup>。清末民國時期，由於鴉片種植帶來的社會失序，武裝地方豪強、外來軍閥部隊與盜匪橫行。這些因素更造成村寨或溝的孤立與封閉，以及對「外來人」的敵意<sup>⑩</sup>。

關於後一背景，我們必須多作說明。明清時期，關於此一地域及其人群，中國文獻留下一些「羌番作亂」，及經中國征伐後改土歸流的記錄。此後貧困的川西農民、

註⑨ 王明珂，「根基歷史——羌族的弟兄故事」，黃應貴主編，時間、歷史與記憶（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民國八十八年），頁三一〇～三一二。

註⑩ 我們可舉例說明這種封閉與孤立的人群認同。首先，在語言上，岷江上游地區「羌族語言」的最大特色便是「話走不遠」。一條溝與鄰近的溝語言都有區別，有時陰山面與陽山面的村寨說話也有差別，相隔更遠一點的村寨間就不能溝通了。因此目前不同溝或地區的一般民衆均以漢話（四川方言）互相溝通。其次，羌族寨子的構築方式是石砌或木石混合的建築，一間間緊密的聯成一大片；其防衛功能是相當明顯的。較大的寨子都有碉樓或殘碉痕跡。這是一種防衛與警戒的石砌構築，經常有五、六層樓的高度。羌寨房屋的窗子都開得很小，以致於室內在白天都是陰暗的。窗子的邊緣內寬外窄，這是在便於防禦的前提下又希望多得一些光線的設計。據他們說，從前寨與寨之間、溝與溝之間互相搶來搶去，打得很兇。現在許多村寨仍在相當高的山上，以及寨子的防衛性構築方式與殘存的石碉樓，都顯示他們所說的十分真實。

投機商人與中國駐軍大量移入本地。清末民初，由於本地山區絕遠，鴉片被引進種植。鴉片種植與貿易，在村寨間產生一些豪強土官。財富以及運用財富放貸，使得他們在當地擁有相當的霸權（coercive powers），打破村寨中及村寨間原有的平等關係。鴉片生產又吸引一批外來漢人「趕煙場」，協助鴉片生產，並在鴉片買賣中謀生。隨著「趕煙場」而來的是黑社會組織「袍哥」的勢力，以及藉「鏟煙」為名行豪奪之實的川西軍閥與國民政府軍隊<sup>①</sup>。於是各地豪強紛紛與袍哥龍頭、川軍軍官勾結，以打擊異己，爭奪鴉片利益。鴉片生產與貿易在當地造成的經濟社會失衡，使得本地西北深遠山溝（特別是黑水地區）中的村寨居民更貧困，因此他們往下游地區打劫也就更加頻繁。

此種社會背景，也使得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全面潰敗時，一批川西國民政府軍官率殘軍投靠黑水頭人蘇永和<sup>②</sup>。黑水及鄰近地區的土官豪強，也因難捨既有利益，而對「解放」採觀望或抗拒的態度。一九五二年中共傾力打下黑水，才將岷江上游地區及其住民納入中國政權直接管轄之下<sup>③</sup>。

#### 四、近代羌族的形成：二十世紀前半葉

在前面我曾說明，中國歷史文獻中的「羌」是一個華夏或漢人的西方異族概念；被指稱的西方人羣並不是一個在歷史中延續的、有我群意識的民族體。我也說明，在二十世紀前半葉岷江上游土著也不認為自身是「羌族」；在狹隘的村寨認同下，他們認為不遠的上游或下游村寨人羣都是「異族」。當時漢人心目中的「羌人」，也與當前的「羌族」在地域人羣指稱上有相當差別。然而，約在這時，國族主義與相關新學術開始流行於中國。在新學術與新概念引導下，「羌族」逐漸形成。在這一節中，首先我說明這個近代知識與相關學術活動背景。

##### （一）近現代羌族歷史與文化建構

十九世紀下半葉，西方「國族主義」（nationalism）、相關的「民族」（nation）概念與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隨著歐美列強的勢力傳入中國。在憂心西方列強在中國的勢力擴張，並深恐「我族」在「物競天擇」下蹈黑種與紅種人之後塵，中國知識分子結合「國族主義」概念、民主改革思想，極力呼籲「我族」應團結以自

註① 一九四二年，由於對抗國民政府軍的「鏟煙」，曾有茂縣北部各村寨聯合攻打茂縣的軍事行動。此即今日茂縣羌族仍津津樂道的「茂北事件」。

註② 有關黑水戰役的前因及經過，請參考郭林祥，陸上台灣覆滅記——黑水蘆花勳匪紀要（江蘇：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王明珂，「陸上台灣—黑水的過去與近況」，歷史月刊，第一四一期，民國八十八年十月，頁四～一〇。

註③ 在此之前，中國對此地域人羣的管轄是相當間接且鬆散的。如，道光年間編的茂州志記載，大姓、小姓、大黑水、小黑水、松坪等五地土官所屬之民，在道光六年曾「改土歸流」由中國直接管轄。然而事實上在二十世紀前半葉，松潘附近的安土司、高土司，赤不蘇附近的王泰昌家族，黑水的高陽平、蘇永和等家族，在當地仍有相當的統轄權。



立自強。在歐美列強積極營謀西藏、蒙古、東北與西南邊區的情況下，結合傳統漢人與四裔蠻夷而成「中華民族」的我群想像，逐漸成爲晚清民初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心目中的國族藍圖<sup>④</sup>。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成立。在新的「民族」概念與傳統華夷之分觀念下，中國知識分子的一項重要工作便是識別、區分邊緣「少數民族」，以使「中華民族」的核心與邊緣更具體，並由「歷史」來詮釋核心與邊緣的關係，讓原爲夷狄華夏的中華民族成員產生一體感。這個刻不容緩的任務，主要由重新建構「民族歷史」與「民族文化」來完成。

在歷史研究方面，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受自西方的「新史學」，可以說便是「民族史」。其以「歷史」建構國族之旨趣相當明白；有開創中國近代史學之功的梁啓超，曾在其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中清晰的表達此一研究旨趣<sup>⑤</sup>。基於民族或種族概念的羌族研究，早見於劉師培、章太炎等人的著作中。一九〇五年，革命派人士劉師培撰寫出版了一本中國民族志。在序言中他說，期望藉此書「喚醒中華種族」。與許多革命黨知識分子相同，這時他心目中的中華種族只是「漢族」。在本書中他指出，「氐羌種族」原爲西方「犬戎」，東移後成爲分布在河南、山西一帶的驪戎、姜戎、伊洛之戎等等。在更大的範圍裡，他又視「氐羌種族」爲「西藏族」的一支。他也指出周之戎狄、漢之氐羌，後來都「風俗行政卒與漢族相融」而混合在漢族之內<sup>⑥</sup>。

對於章太炎來說，「羌」在中國國族中則有更重要的地位。在其〈序種姓〉一文中，章視北方、南方、東北的非漢族群如「非人」的犬蟲之類，而獨視羌爲「人」<sup>⑦</sup>。他又認爲，這些北方、南方、東北的族類「其化皆晚，其性皆獷」，因此「不能予以華夏之名」；然而，他認爲西方之羌又是例外——由於「羌」是中夏之族、神農之後。如此看法，顯然並非建立在章太炎的民族誌知識上，而是基於其傳統中國文史知識。由於「羌」的關聯，章氏又把「衛藏與西域」諸地人群納入華夏之中。在此，我們可以看出回疆與西藏之民被納入中華民族的一個早期思想淵源。無論如何，雖然一方面歷史上與「羌」有關的族群，都被章太炎視爲華夏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又認爲當今之「羌」或西域、衛藏之民，與華夏「種類相似」——雖同種然而還是有差別的。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與劉師培所建構的「羌」或「氐羌」種族，都是「華夏」（或漢族）與西方由回疆、青海到康藏各族群的中間橋樑。如此居於廣大華夏西部邊緣的模糊位置，使得「羌」或「氐羌」在後來的「中國民族史」中，得以發揮其類似粘著

註④ 沈松橋，「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二十八卷，一九九七年，頁一～七七。

註⑤ 他所提出的歷史研究關鍵問題——說明中國民族成立發展之跡，而推求其所以能保存盛大之故，且察其有無衰敗之徵；說明歷史上曾活動於中國境內者幾何族，我族與他族調和衝突之跡何如？其所產結果何如；說明中國民族所產文化以何爲基本，其與世界他部分文化相互之影響何如——都顯示其歷史研究中以「民族」爲研究主體的傾向。見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四七年）。

註⑥ 劉師培，中國民族志（台北：中國民族學會，民國五十一年，初版，民國前四年）。

註⑦ 他稱大幕（漢）南北的遊牧人群爲「犬種」的狄，東北各非漢族群爲「豹種」的貉，南方颶越之東、滇交趾之南各族群爲「蛇種」的蠻。唯對西方「河湟之間驅牛羊而食渰酪」的人群，他稱之爲「牧羊人」——羌。見章太炎，「序種姓」，檢論，一九一九年。

劑的功能。

在民國創建之後，有關「中國民族」或「中國邊疆民族」的歷史研究，更如雨後春筍。在中國歷史文獻中普遍出現的羌、羌人與氐羌等文本，自然也引起學者們相當的研究興趣。枝極既備，樹亦成形。到了三、四十年代，中華民族之歷史結構已規模初具，此時出現許多名為「中國民族史」之綜合性著作。關於「羌」或「氐羌」的瑣碎研究，在此時也凝結為較完整的體系——有關一個民族在歷史上綿延數千年的「歷史」。這個「歷史」，也是更大範圍的「中國民族史」的一部分。在這些著作中，「羌」或「氐羌」皆代表一古代重要民族或民族集團，在數千年歷史過程中一方面與古華夏相爭戰，一方面又不斷融入華夏，因此其後代目前廣佈於漢、藏與許多西南民族之中<sup>⑩</sup>。

雖然羌或氐羌已廣受歷史學者的注意，然而國民政府時期，在漢族知識分子心目中，此一民族只是與今之漢族、「西藏族」或西南民族有關的一個歷史人群概念。很少人認真思考，當代那些人是「羌族」或「氐羌」。甚至於，學者們很少使用「羌族」這族稱；即使提及「羌族」，究竟這是指當代何處的非漢民族，學者的看法也莫衷一是。如，林惠祥認為羌族即當時青海的唐古特族（Tanguts）<sup>⑪</sup>。呂思勉則以為，當代羌族主要在青海、康藏、川西北及雲南維西、中甸<sup>⑫</sup>。很少有學者將此與岷江上游的土著「羌民」聯繫在一起。甚至，可能絕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都不知道「羌民」的存在。早年進入岷江上游「羌民」地區作語言調查的學者聞宥，曾有此感慨：

我儕今日苟未身至川西，固已不知版圖之內，尚有羌人。以一早見於先秦文獻之族類，互數千年，歷無數之移徙混合，卒未滅絕，而並世竟無知之者，斯真學林之憾事矣<sup>⑬</sup>。

這段話顯示，當時知識分子的「歷史知識」中已有一「互數千年」的羌族，然而相對的，他們對羌的「民族知識」仍然淺薄<sup>⑭</sup>。這些也顯示，在民國之初二、三十年的民族史建構中，學者並非追溯一個已存在之「羌族」的歷史。而是在有關「羌」的大量中國歷史文獻記憶中，建構歷史上的「羌族」。

如前所言，在二十世紀前半葉，歷史學者已建構了一個歷史悠久、族裔廣大的「羌族」。相對的，民族學者對於川西「當代羌族」的探索卻面臨許多挫折。他們普遍帶著一個「民族」概念進入田野：「民族」是有共同的血統、語言、文化、風俗習慣的

註<sup>⑩</sup> 林惠祥，*中國民族史*（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六年）；呂思勉，*中國民族史*（上海：世界書局，一九三四年）；呂振羽，*中國民族簡史*（北京：三聯書店，一九四八年）。

註<sup>⑪</sup> 林惠祥，*中國民族史*（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六年），頁一四二。

註<sup>⑫</sup> 呂思勉，*中國民族史*（上海：世界書局，一九三四年），頁二八六～二八七。

註<sup>⑬</sup> 聞宥，「川西羌語的初步分析」，*華西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集刊二*（一九四一年），頁六〇。

註<sup>⑭</sup> 四十年代時，中國知識分子對於這些邊疆人群的了解還很模糊，另有一例可以為證。當時西南聯合大學的秦學聖，曾隨西方學者到岷江上游作調查，目的是在調查他認為應在岷江上游的「苗族」。見 David Crockett Graham, *The Customs and Religion of the Ch'iang* (City of Washington: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58), iii。

一群人。然而，在岷江上游地區，他們對於「羌族文化」的探索，所得結論常是「毫無特色可言」，或「各地多有變化」——他們只見到一些「漢化」或「嘉絨化」的文化特徵。甚至他們懷疑：何者是漢文化、羌文化或藏文化？我曾在一篇論文中以「羌族婦女服飾」為例說明，在成為羌族之前「羌族文化」的模糊特性<sup>20</sup>。另一個例子則是，在《松、理、懋、茂、汶：五縣三屯情況調查》的「風俗」一節中，調查者對漢、回、夷等各族風俗、語言特色有簡單描述。然而，作者對於「羌人」的語言及文化特色，則無隻字片言的介紹。這或也顯示當時描繪「羌人」民族文化的困難。

## 五、共產中國政權下羌族的形成：二十世紀後半葉

如前所言，羌族歷史的基本架構已在二十世紀前五十年完成，羌族文化也在學者的探索之中。然而，當時這些「歷史與文化」尚未成為岷江上游與北川土著人群的集體記憶。如果我們將「民族」視為一成員彼此「認同」的人群，那麼可以說在二十世紀前半葉，在今日羌族地域範圍內此一民族並不存在。建立在主觀認同（ethnic identity）與族群意識（ethnic self-awareness）上的羌族，在一九五〇年代以後才逐漸形成。在這一節中，我將略述此一過程。

### （一）民族識別與少數民族政策

首先，基於前半世紀的羌族歷史、文化與語言研究，加上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社會主義中國積極進行的民族調查，羌族範疇愈來愈清晰。一九五三年中國的人口普查中即包括了民族成分調查。更大規模的民族調查始於一九五六年；16個包含歷史、語言、民族、考古等學科學者的調查組，被遣往各個省分，進行與民族識別分類相關的調查研究。至一九七九年為止，55個中國境內少數民族被國家正式承認。雖然此後仍有學者認為此民族分類、識別有值得商榷之處，地方上也有些族群要求被識別為獨立的民族——特別是一九八四年國家頒布「民族區域自治法」，少數民族的利益與優惠得到國家法律的保障之後。但九十年代以來，共產主義中國的民族政策是不再識別、承認新的民族範疇。

在羌族地區，五十年代以來配合民族識別之需，民族調查也在此展開。據早年曾從事羌族調查的學者告訴我，當年他們以為羌族人口只有兩、三萬人，分布在岷江上游的汶川、茂縣、理縣一帶；北川的人，他們當時都認為是漢人。這與一九五三年的人口統計調查中羌族人口為35,660人是一致的。可見此時羌族的客觀範疇仍然模糊。或者，願意承認自身是「羌族」或少數民族的人不多。羌族客觀範疇的確立，主要賴語言學之助。正如早期在本地作民族調查的學者所說，要分辨羌族除語言外別無它法。於是語言學上的「羌語」，釐清了羌族與當地其他非漢族群間的關係。然而，並非說

註<sup>20</sup> 王明珂，「羌族婦女服飾：一個『民族化』過程的例子」，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九卷第四期，民國八十七年，頁八四一～八八五。

「羌語」的都成爲羌族。

首先，說「羌語」的黑水東部非漢族群，沒有成爲「羌族」而成爲「藏族」。這是由於他們是藏傳佛教信徒，近代以來又與嘉絨人、草地人在政治經濟上關係密切；嘉絨語曾爲當地土司頭人們的官方語言。另一方面，下游的村寨人群認爲黑水人野蠻不講理，也不願意接受黑水人爲他們的「本族人」。黑水人也認爲他們與西方、北方信藏傳佛教的人群關係較密切。因此，黑水人之被劃分、識別爲「藏族」，乃是考慮人群的主觀認同因素，及其宗教文化，而非客觀的語言因素。然而，北路牛尾巴到小姓溝說「羌語」、信仰藏傳佛教的村寨人群，被劃分識別爲「羌族」。

其次，由於許多村寨中的「羌語」都在消失中，或已全然消失；更有甚者，這些村寨中部分家族早已自稱祖先是外來的漢人。因此，如何識別他們的族屬成爲問題。最後的解決辦法是尊重傳統、歷史與人民意願。也就是說，如果本地土著在漢人歷史文獻中曾被記錄爲「羌」，或老一代的人還能說「羌語」，則當前居民就可以登記爲「羌族」。然而，如果口傳家族記憶或族譜證明他們的祖先來自於漢人地區，但由於久居此地，則可以選擇成爲羌族或漢族。雖然家族歷史需經過查驗，由於此主要賴地方鄰里證明，因此選擇成爲漢族或少數民族是相當有彈性的。尤其是，如前節所言，在過去有「蠻娘漢老子」爭論的地區，選擇成爲漢人或少數民族更是自由。

由近年來我對各地羌族老年人的採訪，得知各地區的人、各別的人，在民族識別中成爲羌族有不同的狀況。在有些地區，特別是村寨中仍說著「羌語」的地區，如茂縣西路各溝，常整村整寨的人都登記爲羌族，村民很少有機會否認自身的少數民族身分。有些地區，如茂縣土門，大部分人口先是在一九五四年被識別「漢族」，後來在一九五八年經民族識別後，「漢族」中多數才又改爲「羌族」。

在北川地區，目前大部分的羌族被識別得更晚。在一九五二年，先是只有青片河上游的麻窩地區成立「藏族自治鄉」。一九五三年北川全縣羌、藏族 1757 人；其中羌族只有 59 人，佔全縣總人口 0.07%。一九六四年，羌族也只有 201 人。此後近二十年羌族人口沒有太大變化。一九八一年「建設公社」（原麻窩藏族自治鄉）進行民族成分普查登記，許多人要求由漢族或藏族更改爲「羌族」。於是到了一九八二年，「青片藏族羌族公社」成立。此時羌族人口增加爲 2,001 人，爲總人口的 1.33%。此後，一九八四年白石、馬槽、墩上等羌族鄉或羌族藏族鄉，次年，壩底、外白、開坪、小壩、片口、桃龍、小園、禹里等羌族鄉或羌族藏族鄉，紛紛成立。於是，一九八五年羌族人口增爲 39,722 人，爲總人口數的 26.56%。此後到一九八八年仍不斷的有「羌族鄉」成立。一九八七年，羌族人口爲 52,783 人，佔總人口數的 34.63%<sup>②</sup>。據民族幹部告訴我，目前北川羌族已超過總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因此近年來他們年年上北京請願，要求本地成立爲北川羌族自治縣。以上數據中，最明顯的人口增長是在一九八五年。這應是一九八四年國家頒布「民族區域自治法」，與配合進行的「民族成分普查」造成的結果。據當地人告訴我，當時還有些爭議與矛盾。有些人勸說大家都應登記爲

註② 北川縣志編纂委員會，北川縣志（北京：方志出版社，一九九六年），頁一六二～一七七。

羌族；另有些人說，不可輕易登記，「萬一以後漢人照冊子算帳……」。無論如何，以上人口統計數字顯示，願意讓自己成爲「羌族」的北川人愈來愈多。

爲何愈來愈多的土著（無論原被稱爲漢人或蠻子）願意成爲羌族？最關鍵的因素無疑是現實利益。共產主義中國給與少數民族的優惠，與相關的民族自治政策，使得愈來愈多的人願意成爲羌族。關於社會主義中國的少數民族政策，許多著作中已有介紹。法律條文式的政策不見得都切實被施行；被施行的政策，在少數民族中造成的影響或反響，也不是從條文本身可以分析理解的。因此，我將介紹由羌族觀點所見的少數民族政策，及他們所領會的優惠——主要在三方面：民族之社會地位、生育、教育與地方建設。

首先，土著最先由民族政策中領會的是「民族平等」與「消除民族歧視」。前面我曾提及，過去岷江上游與北川地區，各族群、村落與家族間曾有嚴重的衝突與歧視。羌族地區老年人對於過去被罵作「蠻子」記憶猶新。因此他們也都記得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透過教育、宣傳與法律以執行「民族平等」所造成的情況改變。由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的二十年間，由於反右及文革等社會政治運動，民族政策搖擺不定，因此岷江上游土著對於少數民族認同並不熱心。然而在這期間，由於國家教育普及並深入村寨，造就一批出身農村的羌族知識分子。八十年代初，中共逐步實行包產到組、包產到戶、個體經濟等改革措施，這對於岷江上游少數民族地區有相當的影響。由於山區資源豐富，少了各種束縛後，各個家庭的收入都明顯增加。同時家庭人力愈充足，愈能利用本地多元的資源以增加收入。因此他們更能體會，在生育孩子方面的少數民族優惠所帶來的經濟利益。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少數民族自治逐步施行。一九八四年共產主義中國頒布「民族區域自治法」。此時脫離了文革陰影，羌族知識分子也比較敢於鼓吹本民族認同。民族自治施行最大的影響是，八十年代初起，地方各級政府、教育與生產部門中，許多職位都逐漸由少數民族取代。在茂縣、汶川等地，羌族在所有公職人口中所佔的比例逐年增高，據稱目前已達約百分之六十。「公職」成爲民族自治區一項新的資源——主要由少數民族知識分子競爭、分享的資源。如此也使得羌族普遍感受到教育的重要，以及少數民族在入學優惠上所得的利益。在此，必需說明羌族在教育方面的少數民族優勢。首先，中共建國以後，鄉村小學便逐步深入村寨；這是前清與國民政府時期均未曾有過的。讀完鄉小，優秀的孩童可到城鎮就讀各級中學、職業學校。或者更進一步進入汶川的民族師範學校、成都的西南民族大學，或北京的中央民族大學等就學。在此過程中，都有各種少數民族入學優惠。畢業後，由於民族自治所創造的地方公職，以及由中央到省之各種黨、政、民族系統之代表職位，也使他們有就業機會上的優勢。

在北川地區，「民族平等」與「消除民族歧視」對羌族認同來說尤爲重要。清代以來，歧視與被歧視使得當地土著幾乎都自稱「漢人」，在文化習俗與生活上也全然漢化。此種漢人認同，以及對於族群關係的敏感，使得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前本地「羌族」仍然很少。自從八十年代初西北邊緣青片河上游村寨人群成爲「羌族」後，很快

的由上游而下游，由西北而東南，愈來愈多的人被登記成「羌族」，愈來愈多的鄉成爲「羌族鄉」<sup>⑤</sup>。在此過程中，擔任公職的羌族知識分子之鼓吹與推動，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雖然成爲「羌族」也能帶給他們一些少數民族優惠待遇<sup>⑥</sup>，但北川之所以成爲羌族人口比例最高的縣分，並不只是因爲許多個人利益、群體利益的吸引。更重要的是一個足以驕傲的民族認同——以「大禹」爲本民族歷史象徵的羌族認同<sup>⑦</sup>。

## (二) 羌族歷史、文化及語文的本土建構

羌族認同的本質，並不是全然可以「現實的少數民族利益」來解釋。人們願認同羌族，並以身爲羌族爲榮，也由於「根基性的民族感情」(primordial attachments)。然而此民族感情並非如部分族群研究「根基論者」(primordialists)所主張爲與生俱來，而與近年來之羌族歷史、文化及語文的本土建構有關。

所謂「歷史」，我主要討論的是被社會選擇、創造以詮釋「當今」的「重要過去」。此種「歷史」，以寬廣的定義來說，是一種對人群共同過去的「社會記憶」，包含一般所謂的歷史、神話與傳說。前面我已提及，中國近代少數民族分類中的「羌族」，來自於漢人歷史記憶的重新建構。這些漢族學者所書寫的「羌族史」，固然影響土著的歷史記憶。但不同的羌族，各自有其選擇、重組這些歷史記憶的方式。無論如何，這些「歷史」是讓他們足以爲傲的過去。

首先，對於最廣大的羌族群衆而言，最普遍的歷史記憶莫非是「羌族過去是個強大的民族，被打敗後就四處分散……。」以及，接著他們常說：「所以羌族是藏族、彝族及許多西南民族的祖先。」這是由於，他們原來只有相當狹隘、孤立的區域族群認同；在成爲「羌族」後，相對於藏族、彝族來說，羌族也是人口相當弱勢的民族。因此這個歷史記憶，強化他們的民族自信與自尊。其次，許多的羌族民間故事、傳說與歷史，譬如「大禹和李冰治水」、「樊梨花故事」等等，都述說他們是漢族的「忠實朋友及拯救者」。在民族化成爲羌族後，羌族夾在漢、藏兩大民族之間；受好叛亂的「蠻子」與藏族獨立運動等社會記憶的影響，羌族傾向於以此來與藏族劃清界線，並強調本民族的特質，及其與漢族間長遠的友好關係<sup>⑧</sup>。最後，較流行在羌族知識分子中的歷史記憶，常述說「羌族是比華夏更古老的民族，是華夏構成的主要部分」。炎帝、大禹及相關的歷史，是他們常常談起的羌族祖先及歷史，也因此讓他們以成爲

註⑤ 同前註，頁一七六。

註⑥ 除了少數民族的一般優惠外，較優的地方建設經費，包括大禹紀念館與有關觀光事業的建設經費；建立自治鄉與自治縣後，本地各系統公職人員之晉級等等，都是一些強化羌族認同的現實動機。

註⑦ 自漢代始，就有大禹出生於川西北或北川一帶的傳說。在明清時期，「大禹」是當地漢人強調自身是華夏正宗的符記。因此「大禹故里」一直是北川人認同的重要歷史記憶。八十年代初，在羌族少數民族身分成爲大家競逐的對象時，經過一巧妙的文化與政治過程，北川知識分子將「大禹」建構爲羌族祖先，以此建立以「大禹故里」爲主軸的北川羌族認同。

註⑧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允晨文化公司，民國八十六年），頁三五九～三六〇。

羌族為榮。

在羌族文化方面，特別是色彩炫麗的民族婦女服飾，歡樂洋溢的羌族鍋庄舞與羌曆年，古老神秘的端公與大禹文化等等，目前都是讓羌族人民足以自傲的本民族文化。以服飾而言，這種鮮明的羌民族文化在二十世紀上半葉並不存在。在近代民族主義影響下，「傳統」一方面代表凝聚民族的珍貴先人遺產，一方面代表過去的落伍守舊。因此在「民族化」過程中，少數民族受漢族鼓勵，以他們多彩多姿的「民族傳統文化」特色，來展現中國民族的多彩多姿。羌族村寨婦女受城鎮羌族知識分子的鼓勵，背負本民族「傳統」，以展現本民族特色。如此在各種人群的核心與邊緣權力關係中，羌族婦女服飾愈來愈具民族特色<sup>②</sup>。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這種民族服飾展示，透過各種文化演出、民族畫冊書刊的發行，以及九十年代以來的電視轉播，成為塑造各族人民認同的重要集體記憶。也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過去流行在較漢化的汶川、理縣一帶的牛王節，被擇定推廣為「羌曆年」；曾流行於岷江西岸地區的「沙朗」歌舞，被制定為羌族鍋庄舞。於是，在羌曆年及其它慶典中，羌族婦女穿民族服飾跳「鍋庄」，成為強化羌族認同與展現民族文化的集體活動。

羌族大禹文化與端公，是羌族知識分子所津津樂道的主題；不僅是北川羌族如此。大禹治水，許多城鎮羌族認為這是本民族的古老智慧。他們說，至今羌族仍善於挖井、砌牆。然而，近年來在許多羌族知識分子心目中，大禹又增添許多古老神秘的色彩。他們將「禹文化」和羌族「端公」聯繫在一起。端公是羌族的巫師、醫者與神話故事的傳述者。端公口述經文有上壇、中壇、下壇經，各地端公的口述經文內容有些出入。其內容不外天地開闢、人與萬物的起源、本族人的遷徙歷史，以及一些驅邪趕鬼去病的經文。近年來，一些羌族知識分子熱衷於「禹文化」研究<sup>③</sup>。他們認為，大禹文化表現在端公的法事上。端公作法時所跳的就是「禹步舞」；端公作索卦，就是根據大禹所作的連山易。另有些知識分子熱心於「燦羅古國」的研究，認為這是古羌人在今都江堰市附近所建的古城。他們還組織社團進行此研究<sup>④</sup>。對此不熟悉的羌族知識分子，也喜歡談談這些古老神秘的東西，並引以為傲。而我所加諸於以上這些羌族文化的語詞——色彩炫麗的、歡樂洋溢的、古老神秘的——事實上也是羌族知識分子自我認識與塑造的本民族特質。

在民族語言建構上，羌族的民族識別雖然基本上依循語言學上「羌語」的範疇，然而實際上所謂「羌語」（在當地被稱作鄉談話）在各地、各溝村寨人群間都有相當大的差異。隔一段居住距離的人群，便無法以此語言溝通。一九八九年，在四川省民族委員會的主持下，一項羌族文字創制的計畫開始進行。北川、理縣、茂縣、汶川、

註<sup>②</sup> 王明珂，「羌族婦女服飾：一個「民族化」過程的例子」，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九卷第四期，民國八十七年，頁八四一～八八五。

註<sup>③</sup> 此種熱潮由各種羌族知識分子的出版物中可見；幾乎所有的羌族歷史文化刊物中，都有關於大禹的文章。北川羌族還出版了大禹研究文集及大禹史料彙編等專書。在北川與汶川縣城，大禹也常成為許多店招與廣告牌上的主題。

註<sup>④</sup> 周發賢、王長益，「燦羅古國初解」，西羌文化 1（一九九六年），頁二六～二八。

松潘等地的羌族知識分子代表被推薦出來，集中在汶川、茂縣等地接受語言學的基礎訓練。往後幾年間，他們分組下鄉調查蒐集語言，開會討論、研究，最後決定以「曲谷方言」為標準羌語。以此制定拉丁拼音的羌族文字，制定相關的羌語詞典。並在汶川的威州師範學校建立羌語班，培訓標準羌語文師資。同時在此過程中，這些羌族知識分子也致力於羌族文化的蒐集、研究與推廣。雖然各地羌族間的共同語仍是「漢話」（川西方言），而且顯然改變不易<sup>20</sup>。但此共同語言文字的創制與推廣活動，在凝聚羌族認同上有相當的意義。

近五十年來羌族的形成，經歷了一個相當複雜的過程。涉及西方傳來的民族主義與「民族」概念，漢族知識分子的國族建構與相關的歷史書寫，核心（漢族、城鎮知識分子、男性）與邊緣（羌族、村寨居民、女性）的權力關係，以及此關係下的本土歷史、文化及語言的建構。在這其中，個人與群體利益的角逐，自然是近代羌族構成及人們願認同此民族的重要因素。但在羌族認同及相關文化的催化下，許多個人與群體的行爲，已無法簡單的由現實利益來解釋。更重要的是，所有這些「近代過程」都基於古代中國人對「羌」的詮釋與再詮釋，以及此歷史過程中所留下的歷史記憶。因此羌族形成的近代過程，只是一個更長遠歷史過程的一部分，在此長遠歷史過程中延續的是一個多層次的核心與邊緣人群關係。

## 六、結語：中國西南民族研究中的學術與現實

無疑「羌族」是在近代中國的國族建構中，經由歷史想像而創造出來的「民族」。近年來，基於「後現代主義」的國族主義研究、近現代史研究及第三世界少數民族研究者，或說明在近代國族主義下「民族傳統」的創造過程，或提出在國族主義風潮下許多民族及其歷史如何被想像、創造。在這一層次上，我同意他們的觀點。羌族的例子也支持這樣的觀點。基於「歷史民族實體論」之線性民族史，在知識層面已如昨日黃花。

然而在此研究取向之下，學者對於漢族中心主義下中國西南與南方少數民族之識別與分類的批評，以及對「近代民族及其歷史」的解構，也有可商榷與不足之處。從歷史及歷史記憶方面來說，晚清以來的「羌族」與「羌族歷史文化」建構，只是兩千多年來「華夏」不斷想像、建構其西方族群邊緣過程的最新階段（或許不是最後階段）。近代延續此華夏邊緣想像的章太炎、梁啟超、劉師培等人，本身也是此異族想像歷史的產物。由這一層次來說，國族主義研究者或近現代歷史研究者對「民族」或「傳統」的理解顯然有不足之處。他們都忽略了造成當代「民族」與「傳統」之近代之前的歷史與歷史記憶背景，也忽略了「歷史」的創造者本身也是歷史的創造物。這仍是一種「近代主義者」（modernists）的偏見——認為當代世界所有的政治社會現象

註<sup>20</sup> 許多羌族中老年人，目前對於「漢話」與「鄉談話」的看法是：「漢話」不用學就會，但「鄉談話」倒需要學才會。



都可追溯到，且只需追溯到，「近代」的一些轉變如國族主義、殖民主義、西方式民主、西方與「土著」的接觸及其影響等等，也因此強調此「近代」與「古代過去」之間的斷裂。由本文中羌族的例子可見，當代「羌族」是一個長久的西方漢與非漢關係史的產物；近代變遷只是此過程的一部分。若忽略此「近代」以前的歷史過程——華夏以「羌」定義其族群邊緣的過程——我們難以充分了解近代漢族知識分子的「羌族史」建構，也難以理解羌族知識分子的本民族歷史文化建構。近代西力之衝擊，固然在歐美外之世界各地造成很大的影響。然而這些改變並非與當地的過去全然斷裂；在當前非西方世界的民主政治、民族主義、民族國家等概念與制度之中，我們常能見到許多本土歷史與文化的基礎及其延續。

由「族群」或「民族」定義來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的人類學族群研究，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由於受 Fredrik Barth 等人的影響，學者們多認為族群意識、主觀認同與相關的「異己感」是了解與界定族群的關鍵；很少有學者仍認為客觀的語言、文化特徵等可以界定一個族群。中國學者（及官方）以語言、文化、共同經濟生活等因素來界定一個「民族」，固然是基於一種陳舊的「民族」定義。但是批評此種民族分類「不合理」的學者們，也常以一「民族」中各支系的語言、文化分歧為理由<sup>39</sup>。無疑熟悉當代族群理論的學者們，在此立場有些自我矛盾。再者，有些學者強調「土著經驗與觀點」——如土著認為他們與同「民族」的另一支人語言不通或文化上有區別——以此駁斥中國之少數民族分類、識別的不合理。在此他們或也忽略了，在語言、文化異同的觀點上「土著」間常有不同的意見；忽略了在某種權力關係下，「土著」一直在爭論、建構本「民族」的共同語言、文化；更忽略了在刻板化的國家與少數民族、漢與非漢、西方與東方等主從、優劣意識形態下，土著不僅揣摩迎合主體民族對他們的認知，也揣摩迎合西方、東洋學者對他們的認知。

在羌族的例子上，以此而言，羌族不只是近代中國國族主義歷史想像下的產物，也不只是兩千年來「華夏邊緣」變遷歷史下的產物，他們也被自己所選擇、創造與潤飾的「歷史與文化」所塑造。在接觸民族概念與以漢文傳遞的歷史知識之後，在本土歷史心性與漢族歷史心性間的轉化與揉合下，他們選擇、創造自己的歷史與文化，以建立羌族認同。雖然，本土歷史文化在不同地區、不同教育程度的羌族間，在居鄉與居城的羌族間有不同的內涵，甚至他們間有些爭論。然而，一個有共同歷史與文化的「羌族」，是目前所有羌族人民的民族認同。在這個本土歷史文化建構中，漢族對傳統西方邊緣異族的歷史文化記憶，以及以漢族意識為主的國家權威，以及歐美與日本所代表的資本主義科技與物質文明吸引力，都是土著知識分子無法擺脫的。

最後，經由文獻研究與田野考察，學者們可以各抒己見，相互辯駁。然而，少數民族研究又有其現實的面相——那是一群活生生的人，生活在各種認同、區分與相對應的權力與資源分配分享體系之中。審視三千年來的羌人或羌族書寫，特別是近百年

註<sup>39</sup> 此觀點明確表達於一本由 Stevan Harrell 編輯出版之論文集集中；見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ed. by Stevan Harrell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5), pp. 63~65, 92~99, 50~53, 119.

來的羌族史書寫，我們或可以再思考：無論是盲目隨一時潮流建構一族群，與相關的民族知識體系，或在新的學術典範下解構此一族群與知識體系，都應注意被研究者是否在意識、社會與經濟上被邊緣化？或解構後之新知識是否能造成更正確的族群分類體系及更好的族群關係？或者，爲此我們仍須期盼一個新的研究典範。

\* \* \*



# The Qiang Nationality: a Critique of the Theory of Modern Invention

*Ming-ke Wang*

##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the Qiang nationality has resulted from a complex process in the modern era involving nationalism and the concomitant notion of “nation,” the nation-state building scheme and related historical narratives of the Han, the core versus peripheral human relations at various levels, and native efforts in constructing their own history, culture and language. Most importantly, this modern process is only the newest stage of a long historical process in which the Han Chinese delineated and re-delineated their western ethnic boundary by defining and redefining who were the Qiang in China's western frontier.

In this article, first I introduce “the Qiang” in China's historical memory. Then, I proceed to explain the modern process by which the Qiang become a minority nationality – especially, the native developments of the Qiang identity and cultures. I argue that the theory of “modern invention” that has been used to understand or interpret the Chinese nation and her nationalities is inadequate, or at least, incomplete.

**Keywords:** the Qiang; ethnicity; China's minority nationalities; nationalism

